

Library of Classical Studies

西方古典学研究



册子本起源考

[英] C.H. 罗伯茨 T.C. 斯基特 著

高峰枫 译



The Birth of the Codex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册子本起源考

The Birth of the Codex

[英] C.H. 罗伯茨 T.C. 斯基特 著

高峰枫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5-416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册子本起源考/(英)罗伯茨(Roberts, C. H.), (英)斯基特(Skeat, T. C.)著; 高峰枫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11
(西方古典学研究)

ISBN 978-7-301-26418-8

I. ①册… II. ①罗…②斯…③高… III. ①古籍研究—西方国家
IV. ①G25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50568 号

© The British Academy 1983

This translation of *The Birth of the Codex* was first published in 1983 and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British Academy.

书 名	册子本起源考
著作责任者	[英] C. H. 罗伯茨 T. C. 斯基特 著 高峰枫 译
责任编辑	田 炜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6418-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wsz@126.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577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定 价	965 毫米 × 1300 毫米 16 开本 10 印张 120 千字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30.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西方古典学研究 *Library of Classical Studies*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黄 洋（复旦大学）

高峰枫（北京大学）

编 委：

陈 恒（上海师范大学）

李 猛（北京大学）

刘津瑜（美国德堡大学）

刘 玮（中国人民大学）

穆启乐（Fritz-Heiner Mutschler，德国德累斯顿大学；北京大学）

彭小瑜（北京大学）

吴 飞（北京大学）

吴天岳（北京大学）

徐向东（浙江大学）

薛 军（北京大学）

晏绍祥（首都师范大学）

岳秀坤（首都师范大学）

张 强（东北师范大学）

张 巍（复旦大学）

“西方古典学研究”总序

古典学是西方一门具有悠久传统的学问,初时是以学习和通晓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为基础,研读和整理古代希腊拉丁文献,阐发其大意。18世纪中后期以来,古典教育成为西方人文教育的核心,古典学逐渐发展成为以多学科的视野和方法全面而深入研究希腊罗马文明的一个现代学科,也是西方知识体系中必不可少的基础人文学科。

在我国,明末即有士人与来华传教士陆续译介希腊拉丁文献,传播西方古典知识。进入20世纪,梁启超、周作人等不遗余力地介绍希腊文明,希冀以希腊之精神改造我们的国民性。鲁迅亦曾撰《斯巴达之魂》,以此呼唤中国的武士精神。1940年代,陈康开创了我国的希腊哲学研究,发出欲使欧美学者不通汉语为憾的豪言壮语。晚年周作人专事希腊文学译介,罗念生一生献身希腊文学翻译。更晚近,张竹明和王焕生亦致力于希腊和拉丁文学译介。就国内学科分化来看,古典知识基本被分割在文学、历史、哲学这些传统学科之中。1980年代初,我国世界古代史学科的开创者日知(林志纯)先生始倡建立古典学学科。时至今日,古典学作为一门学问已渐为学界所识,其在西学和人文研究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之下,我们编辑出版这套“西方古典学研究”丛书,希冀它成为古典学学习者和研究者的一个知识与精神的园地。“古典

II 册子本起源考

学”一词在西文中固无歧义,但在中文中可包含多重意思。丛书取“西方古典学”之名,是为避免中文语境中的歧义。

收入本丛书的著述大体包括以下几类:一是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近年来国内开始出现一批严肃的西方古典学研究者,尤其是立志于从事西方古典学研究的青年学子。他们具有国际学术视野,其研究往往大胆而独具见解,代表了我国西方古典学研究的前沿水平和发展方向。二是国外学者的研究论著。我们选择翻译出版在一些重要领域或是重要问题上反映国外最新研究取向的论著,希望为国内研究者和学习者提供一定的指引。三是西方古典学研习者亟需的书籍,包括一些工具书和部分不常见的英译西方古典文献汇编。对这类书,我们采取影印原著的方式予以出版。四是关系到西方古典学学科基础建设的著述,尤其是西方古典文献的汉文译注。收入这类的著述要求直接从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原文译出,且译者要有研究基础,在翻译的同时做研究性评注。这是一项长远的事业,非经几代人的努力不能见成效,但又是亟需的学术积累。我们希望能从细小处着手,为这一项事业添砖加瓦。无论哪一类著述,我们在收入时都将以学术品质为要,倡导严谨、踏实、审慎的学风。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引领读者走进古希腊罗马文明的世界,也盼望西方古典学研习者共同关心、浇灌这片精神的园地,使之呈现常绿的景色。

“西方古典学研究”编委会

2013年7月

译者说明

《册子本起源考》一书的要点及其后续的讨论,请见《中译本导言》。这里,对几个术语的汉译,稍作说明。

两个关键术语,英文的 roll 译作“卷子本”或“卷子”,codex 译作“册子本”。如果涉及书册制度,则分别译作“卷轴装”和“册页装”(codex form)。

书中的 manuscript 一字,一律译作“写本”。不管是保存相对完整的整册的抄本,还是残篇、残片,只要是书中讨论的公元 5 世纪之前抄写的书籍,统称为“写本”。

书中常用的 literary papyri,我译作“纸草典籍”,指抄有典籍的纸草文献。所谓“典籍”指的是文学和学术活动所产生的文本,不包含有特定社会功能的文书,比如法律文书(契约、遗嘱等)、私人书信、公文或者知识水平不高的人群的书写练习(学生的习字帖、涂鸦)。比如 Roger A. Pack 所编的《希腊罗马时代埃及出土的希腊文、拉丁文典籍写本编目》(*The Greek and Latin Literary Texts from Greco-Roman Egypt*),著录的就是文学、哲学、医学和科学方面的纸草文献。所以,这里所使用的 literary 一字,非指狭义的“文学”。同理,在《册子本起源考》中, literature 一字,有时译为“文献”,是取更广泛的意思;有时则译作“典籍”,以显示与文书类写本的区别。

2 册子本起源考

Parchment 一字译作“皮纸”，是参考复旦大学苏杰教授的译法。传统上，parchment 多译作“羊皮卷”，但不够妥当。一来，制作皮纸的材料包括各类兽皮，如羊皮、牛犊皮等，并非全是羊皮；二来，parchment 在早期的用法，主要指书写材料的质料，与写本的形制不一定有必然的联系。使用 parchment 制成的书籍，不一定是卷子本，也可以是册子本。而“羊皮卷”的译法，已隐含有卷子本的意思。译作“皮纸”的话，一则不必明言是何种兽皮，二则表明是用于书写之用，因此我以为是一个妥帖的译法。

英文中 page 和 leaf(或 sheet)有所区分。凡指称单张的纸草，称“一叶”纸草。比如，卷子的制作，是将多张纸草“叶子”粘连而成。而讲到册子本的页面，则称“一页”。因此，册子本中的“一叶”纸草，当正反面都书写时，实际上就有“两页”的书写空间。

本书两位作者多用“非基督教”(non-Christian)这一比较中立的表达法，但有时也用 pagan 一字。中文通常把 pagan 译成“异教”，这是以基督教为本位的译法，含有基督教对古代传统宗教的歧视。今译作“教外”，虽仍不免保留了基督教的口吻，但毕竟比“异教”语气要更宽缓一些。

凡是作者在正文中引用希腊文、拉丁文文献，除引文译成中文之外，译文之后将原文加在括号中，以备读者检审。但若作者在正文中引用近人的著述，不管是何种现代语言，都径直翻译，不另附原文。

书中提到大量出土的纸草文献，分别藏于西方各大博物馆及大学。作者提到这些纸草写本时，往往使用专业内部的缩写。我根据特纳的《希腊文纸草导论》一书第2版(E. G. Turner, *Greek Papyri: An Introduction*, Oxford, 1980)第九章“纸草文献主要刊本”(第154—179页)，尽量将缩写还原成全称，同时保留原来的

缩写,以方便读者。作者在注释中引证的期刊论文,我尽量将期刊的名称译出。但有些期刊只列出了缩写,全名暂时查不到,只好先将缩写照录一遍。

在翻译过程中,我曾就几个关键的译名,向北京大学历史系辛德勇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孟彦宏研究员请教,在此表示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田炜女士,对译稿的编辑,提出了很细致的意见,弥补了很多不足。这本《册子本起源考》篇幅虽短,但属于比较繁琐的考证研究,涉及多方面的文史知识,引用了多种语言的研究文献。译文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不足之处,还请读者多多指正。

高峰枫

2015年9月

中译本导言:从卷子本到册子本

西方古代标准的书籍形式是卷子(roll)。古希腊罗马时代,制作卷子最流行的材料是埃及出产的纸草。间或有用羊皮或牛皮进行打磨和漂白,制成可以书写的皮纸(parchment),但就文献记载和出土发现来看,纸草卷子乃是古典时代主流的图书装帧形式(犹太经典不在讨论之列)。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 23—79)在《博物志》中有一段著名的记载,详述纸草的制作,还涉及当时(公元1世纪)制作的不同尺寸、不同质量的纸草。^①制作卷子的标准做法,是将20张固定尺寸的纸草叶子粘连在一起。纸草纤维的纹理呈水平方向的一面,比较光滑,吸附性好,称为正面(recto)。纹理呈垂直方向的一面,纸面相对粗糙,称为反面(verso)。职业的抄工(scribes)将所要誊抄的文本,分栏书写,经常连同母本上所施的句读以及其他标记符号也一并制。比较讲究的抄本,卷子背面是空白。只有当书写材料匮乏、或者抄写者用于私人用途,才会使用背面。使用这种标准规格的卷子时,如果抄写的空间不够,则在卷子的尽头继续粘上散叶的纸草。

^① 普林尼,《博物志》(*Natural History*),第13卷,第74—82章。拉丁原文、英译以及比较详细的注释和讨论,可见 Nephtali Lewis, *Papyrus in Antiquity*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74),第34—69页。

一张抄写典籍的纸草卷子,长度是非常可观的。以往学界流行一种说法,认为卷子的长度通常为6—10米。^②但据最近的发现以及更加科学的推算,长达15米以上的卷子也并不罕见,个别卷子甚至有23米长。^③卷子收拢起来,形成卷轴,可以放在专门的书筒里。读者阅读时,一般左手持握卷子最左端,右手展卷,打开1米左右的卷面。待读过这一部分文字之后,左手收卷,右手继续展卷,就这样一收一放,重复进行。待读到卷子的末端,不能直接将卷轴立即插入书筒,而需从最右端开始,将卷子全部倒卷回去,以保证下一次阅读时起首的文字仍位于卷子左端。其实,论广义的文字记录,希腊、罗马还同时有多种文字载体,比如古希腊的陶片、古罗马的木牍以及勒于金石的铭文,但对于复杂智力活动产物的“典籍”而言(指诗文、学术类文本),也就是有别于书信、契约、簿记这些日常文书,够得上“书于竹帛”的那些著作,卷子是被公认的、享有绝对文化权威的书籍形式。苏格拉底说任何人都能在市场上买到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的“书”(《申辩》,26d),他指的就是这样的纸草卷子。

西方现代的书册装帧形式,已不再是卷轴装,而是册页装。以册页装制成的图书,称作“册子本”(codex)。所谓册子本,从古代晚期开始,指将数叶纸草或者皮纸叠放在一起,从中间对折,然后从对折的地方固定、装订,再加上封皮作为保护。简单来说,就是

② 比如,凯尼恩就认为,抄写希腊文典籍的正常的卷子本,长度一般不会超过35英尺(合大约12米)。参看Frederic G. Kenyon, *Books and Readers in Ancient Greece and Rome*, 2nd edition,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51, p. 54。

③ William A. Johnson, *Bookrolls and Scribes in Oxyrhynchu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4, pp. 148-149. 根据Johnson的意见,正常的卷子,其长度的上限应该提高到15米左右。

我们今天习见的、翻页的现代图书。从公元4世纪开始,西方书籍的制作中,册子本的比例逐渐增大,而传统文人雅士终日捧读的卷子本逐渐式微。进入中世纪以后,册子本更是一统天下,完全取代了卷子本,成为主导的书籍形式,这种霸主地位一直延续到今天。研究西方古代的书籍制度,册子本的起源是无法绕开的问题。一种士人阶层所不屑使用的图书装帧形式,何时演变成为有资格承载文化典籍的书籍形式?有哪些重大历史事件、哪些深层社会力量推动着西方书册制度完成了这场影响深远的变革?研究书籍史和版本学,都需要解答这样的问题。

《册子本起源考》的两位作者

1954年,英国古文书学家和纸草学家罗伯茨(Colin H. Roberts, 1909—1990)在《不列颠学院集刊》(*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第40期,发表了一篇35页的论文,题为《册子本》(“The Codex^④”)。近30年后,他与另一位著名古文书学家斯基特(T. C. Skeat, 1907—2003)一道,对此文做了大幅增订,于1983年出版了《册子本起源考》(*The Birth of the Codex*)一书,对上述问题做了全面的讨论。

两位作者的生平和学术研究,我先做一个简要的介绍。罗伯茨的全名是Colin Henderson Roberts,依英国人习惯,通常省略做C. H. Roberts。^④罗伯茨在牛津读书时,老师中对于纸草文献感

④ 关于罗伯茨的生平,我主要参考了《不列颠学院集刊》在他去世之后刊出的悼词:“Colin Henderson Roberts. 1909-1990”(*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84, 479-483)。作者是D. A. F. M. Russell和P. J. Parsons。

兴趣者不乏其人,对他产生了一定影响。他 1932 年去柏林,向德国著名古文书学家威尔海姆·舒拔(Wilhelm Schubart)学习,还去埃及参加过考古挖掘工作。在 20 世纪 30 年代,罗伯茨在牛津圣约翰学院担任研究员,整理了曼彻斯特大学约翰·莱兰茨图书馆(John Rylands Library)收藏的一些圣经纸草残片。二战期间,他和许多学者一样,为英国情报部门工作。战后,他重返圣约翰学院,为重振纸草学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1954 年到 1974 年,他一直执掌牛津大学出版社。在处理纷繁的行政事务之余,他仍发表了重要的研究著作,其中最重要的一本是《早期基督教时代埃及的写本、社会和信仰》一书。^⑤

这本小书和《册子本起源考》一样,篇幅短,容量大,浓度高。罗伯茨将其丰富的纸草学知识,运用于对早期基督教在埃及的发展的历史研究。在传世文献中,关于公元 1 世纪和 2 世纪埃及教会的历史,只有零散的材料。但是从 2 世纪后期开始,诺斯替教派(Gnosticism)在埃及大行其道,而 3 世纪的亚历山大城成为基督教神学、解经学和圣经校勘学的中心,埃及一跃而成为操希腊语的东部教会的重镇。但 2 世纪中期之前的史料却少而又少,此点殊不可解。罗伯茨在这本书中,力求通过对出土写本的研究,来推知埃及基督教初年的情况,以弥补文献不足的缺憾。全书分三章,第一章对埃及出土的基督教写本做了整体的介绍,从出土地点的分布、写本的外在特征(形制、开本、书上的标记)乃至抄工誊写时所采用的书体,都有极为精当的概述。第二章着重于“圣名缩写”(Nomina Sacra)。所谓“圣名缩写”,是早期基督教写本一个

⑤ *Manuscript, Society, and Belief in Early Christian Egypt*. London: Published for the British Academy by th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鲜明的特征,指的是对圣经中若干具有特殊神学意义的字词(比如“上帝”“耶稣”“基督”等),采用缩写的方式。最常见的办法,是取希腊文单词的首尾两个字母,上面加画一条横线。罗伯茨考察了此种独特书写习惯可能的来源,以及其中蕴涵的神学思想。第三章则根据前面的描述,努力勾勒埃及教会的特征和发展。

另一位作者斯基特,全名为 Theodore Cressy Skeat,通常写作 T. C. Skeat,长罗伯茨两岁。^⑥ 斯基特从剑桥大学毕业之后,终生在大英博物馆写本部(Department of Manuscripts)工作,1931—1948 年担任写本部主任助理(Assistant Keeper),1948—1961 年担任副主任(Deputy Keeper),1961—1972 年担任主任(Keeper)。1933 年,英国从苏联政府手中以 10 万英镑的价格购买了《西奈抄本》(Codex Sinaiticus)。这是一个 4 世纪的圣经希腊文抄本,是目前所存最早的基督教圣经全经抄本(年代更早的写本有存世,但都是残篇残叶)。作为刚刚进入大英博物馆写本部的青年才俊,斯基特立即被委以重任,与其他两位同事一道,负责这部珍贵写本的保存和整理。1938 年,斯基特与同事出版了《西奈抄本的抄工和校改者》一书,是研究《西奈抄本》的奠基之作。^⑦ 在此之前,他与老一辈的学者贝尔一道,共同整理出版《一部未知福音书和其

⑥ J. K. Elliott 将斯基特发表在专业期刊的论文,编辑成《斯基特圣经学论文集》(*The Collected Biblical Writings of T. C. Skeat*, Leiden: Brill, 2004)。他为论文集撰写了一篇导言(第 ix—xxvi 页),介绍了斯基特的生平和学术贡献,并附有斯基特所有著述的详细目录。下面两段主要参考了这篇导言。

⑦ H. J. M. Milne and T. C. Skeat, *Scribes and Correctors of the Codex Sinaiticus*, London: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Library, 1938. 此书当年仅印了 500 册。

他早期基督教纸草残篇》。^⑧ 这部新约正典之外的福音书残本,现在称为“艾格顿2号纸草”(Egerton 2 Papyrus)。此外,斯基特还编写过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希腊文纸草文献的编目。他直到95岁高龄,仍发表有关福音书校勘和埃及历法的论文。2004年由J. K. Elliott编辑的《斯基特圣经学论文集》收录了斯基特在写本学(codicology,包括古代图书的制作和形制方面的研究)、新约写本以及新约校勘学三个领域的重要论文,我们可以大体窥见斯基特学术研究的方向和规模。斯基特的论文中,被广为引用的是他为《剑桥圣经史》第二卷所撰写的文章《早期基督教图书制作:纸草与写本》。^⑨ 这篇文章总结了20世纪60年代之前他对于早期基督教图书的看法,有些观点后来自己不断修正或者展开。

罗伯茨和斯基特长期从事出土写本的一线研究,都是古文书学专业内卓有建树的大学者。他们对纸草文献,终日摩挲,了如指掌。再加上他们的古典学功底深厚,能将过去几代学者从古籍中发现的有关书籍制度的史料加以重新整理和解读,因而最有资格“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册子本起源考》这本书,薄薄一册,正文不足80页,却建筑在二位作者深厚的旧学根底和对出土写本几十年释读和整理的基础之上。作者所得出的结论,三十年之后来看,已有很多值得商榷之处,但这部小书在西方古典文献学、古文书学、写本学诸领域,都堪称经典之作。

⑧ H. I. Bell and T. C. Skeat (ed.), *Fragments of an Unknown Gospel and other Early Christian Papyri*. London: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935.

⑨ “Early Christian Book-Production: Papyri and Manuscripts”,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ible*, vol. 2: *The West from the Fathers to the Reformation*, ed. G. W. H. Lam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54-79. 此文收入《斯基特圣经学论文集》,第33—59页。

册子本算“书”吗？

《册子本起源考》(以下简称《起源考》)先破除了学界一些长期流行的误解。比如从 19 世纪末开始,都以为凡是卷子本必用纸草,而凡是册子本则一定用皮纸。而实际上,书籍的形制(卷子本或册子本)与书写材料(纸草还是兽皮),并无绝对的关联。又比如,学界长期相信古代的传说,认为皮纸是公元前 2 世纪在古城帕伽玛(Pergamum)发明的。帕伽玛的图书馆是古代继亚历山大城之后又一个学术重镇。根据这一传说,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嫉妒这一新兴的藏书中心,为打击竞争对手,便想出釜底抽薪的办法,禁止向这个小亚细亚古国出口埃及所特产的纸草。抄书却没有纸用,这就迫使帕伽玛想出应对的方案,发明了皮纸,从而获得纸张供应的独立。另外,“皮纸”一字,拉丁文写作 pergamenum,让人易产生联想,以为这种书写材料真的创自帕伽玛。其实,兽皮之用于书写材料,古已有之,实在不必依赖某桩突发事件而突然涌现。而且即使埃及真的实施过禁运,恐怕也难以奏效,因帕伽玛可轻而易举从他国间接获取纸草。像这样长期流传的说法,两位作者汇集其他学者的研究,均一一破除。

再比如“重写本”(palimpsest)的问题。所谓“重写本”,指将誊写在旧卷子上的文字擦掉,再书写新的文字。也就是将旧卷子重新使用。之所以会出现重写本,或者因为卷子不够用,于是将价值不大的文字除去,代之以新的文本;又或者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淘汰已经过时或者为现时所不取的书籍。最常见的例子,是中世纪的僧侣将古典文本涂去,然后重新抄写基督教文字。过去学界以为,凡是重写书,必然指皮纸,因为兽皮经久耐用,将先前书写